

第二節、吳佩孚工作的角力戰

有關抗戰期間日方勸誘吳佩孚「出山」組織政府的研究不少，以往台灣學者的說法咸認為吳是一位有民族觀念的愛國者，但是大陸學者引用原《日本駐中國大使館檔案》對吳有不同的評價，本文在該檔案基礎上再引國史館「中統」阻止吳出山的檔案，國史館檔案尚未見人引用，本文得出之見解因而又與大陸稍有不同，而對於吳佩孚到底死於日本人或中國人之手，本文亦有所推論。由於日人勸進吳佩孚出山過程中，汪精衛是一個要角，吳一直拒見汪氏，使得「汪、吳合作」破局，也使最後成立的汪政府性質改觀，減低對重慶的殺傷力，其中不能忽視重慶「中統」特工人員的作用，所以在拉攏吳佩孚的過程中也是重慶與汪精衛地下鬥爭的另一個戰場，有必要加以探討。

民國十五年七月，國民革命軍於長沙及武昌戰役消滅吳佩孚的主力。吳逃至河南鄭州，民國十六年再逃入四川奉節。民國二十年發生「九一八事變」，吳致電成都日本領事館表示抗議，同年冬，吳佩孚結束五年多寓蜀的流亡生活來到北平¹，時任「華北軍政長官」的張學良率文武官員迎之於車站，吳隨即回到原北平東城什錦花園自宅²。民國二十一年三月九日溥儀的「滿洲國」成立，吳再發通電予以痛斥，四月應國民政府於「國聯」控訴日本侵略，國聯李頓調查團至東北，李頓等途經北平時，吳寫了致國聯調查書極力主張維護中國領土完整和主權獨立。民國二十四年十一月，殷汝耕在日人授意下成立「冀東防共自治政府」，吳佩孚拒絕參加³。

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七日「蘆溝橋事變」爆發，九月六日日本華北方面軍參謀岡田直三郎給「北平特務機關長」喜多誠一的指示中提到：「關於建立華北政權的準備，暫建立政務執行機關，以統治現在及將來的軍佔領區的中國方面各機關，且盡量使之成為將來華北政權的基礎」⁴，由於軍事的得手，日本決心於中國樹立親日政權，至於新政府的領導人，喜多誠一認為適合的理想人物為靳雲鵬、吳佩孚、曹汝霖三人，喜多計畫以靳或吳任總統，或分任總統、副總統，曹汝霖則為總理。因為日方認為靳雲鵬曾為北洋政府總理，尚有相當威望，而吳佩

¹ 汪希亮，《直系儒帥吳佩孚》，(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3月第一版)，頁403~404

² 劉泗英，〈息影北平〉收在吳佩孚先生集編輯委員會，《吳佩孚先生集》，(台北：吳佩孚先生集編輯委員會，民國49年3月20日出版)，頁432。吳佩孚雖已失勢但仍一直保持原大帥府的「八大處」，作者當時為吳之「政務處」處長。以下續引時簡稱《吳佩孚先生集》。

³ 汪希亮，《直系儒帥吳佩孚》，(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3月第一版)，頁403~404。

⁴ 北野民夫發行，《現代史資料(9)－日中戰爭(二)》，(東京：みすず書房，昭和39年9月30日第一刷發行)，頁41~42。

孚則可吸引一些雜牌軍投歸，曹汝霖則本為親日份子。但三人最後都沒答應⁵。當時「滿洲國」外務大臣張燕卿、曾為北洋政府官員的江朝宗都到北平活動，張燕卿在日軍部支持下成立「新民會」，江朝宗成立「維持會」，但都沒得到喜多的青睞，最後喜多請在上海的王克敏到北平組織新政府，十二月十三日中國首都南京陷落，日方軍事當局認為這是國民黨政府的潰滅，乃於十二月十四日在北平懷仁堂成立「中華民國臨時政府」⁶。十二月二十四日日本政府內閣會議決定處理華北的方針提到：「政治的目標是建立防共親日滿的政權 逐步擴大和加強這個政權，使它成為重建新中國的中心勢力 華北新政權，作為上述政權的首腦，要網羅在全中國有信譽的人才」⁷。

民國二十七年一月十六日日本首相近衛發表其著名的第一次對華聲明：「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⁸，也就是日本政府已不承認國民政府代表中國政府，於是三月二十八日，日方再於南京成立「中華民國維新政府」，梁鴻志任行政院長，溫宗堯任立法院長⁹。然而南北兩個親日政權的成立並未使國民政府屈服，也對瓦解整個中國抗日戰爭未起多大作用，於是民國二十七年六月間日政府為了統一陸軍、海軍、外務三省的駐華機關，乃由各省派出代表組成「對華特別委員會」，做為在日軍佔領區內推動建立統一的中央政權的工作，當時各省的代表，陸軍是土肥原賢二中將，海軍是津田靜枝中將，退役陸軍中將坂西利八郎為外務省代表。三位中將經過協商，決定以土肥原中將為負責人，至於中國新政府領導人，土肥原決定推舉三位人選，即唐紹儀、吳佩孚、靳雲鵬¹⁰。於是陸軍成立了「土肥原機關」以協助陸軍的特務工作，準備起用所謂中國的第一流人物¹¹。

七月八日「五相會議」決定：「擴大加強親日政權的同時，盡快使這些政權統一起來成為一個政權，真正實現為中國中央政府，使內外不得不承認其是實際上代替中國現中央政府的新政權」¹²，也就是日方急於要成立一個包括南北兩親

⁵ 章伯鋒、莊建平主編，中國史學會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中國近代史資料之十三—抗日戰爭》，(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97)，頁 226。

⁶ 章伯鋒、莊建平主編，中國史學會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中國近代史資料之十三—抗日戰爭》，(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97)，頁 226~229。

⁷ 外務省編，《日本外交年表並主要文書(下)》，(東京：原書房，昭和 41 年 1 月 15 日發行)，頁 381~384。

⁸ 外務省編，《日本外交年表並主要文書(下)》，(東京：原書房，昭和 41 年 1 月 15 日發行)，頁 386~387。

⁹ 黃友嵐，《抗日戰爭時期的和平運動》，(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8 年 8 月第一版)，頁 47。

¹⁰ 今井武夫著，天津市政協編譯委員會譯，《今井武夫回憶錄》，(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7 年 8 月第一版)，頁 105。

¹¹ 衛藤審吉著，陳鵬仁譯，《東亞政治史研究》，(台北：水牛圖書出版事業有限公司，民國 89 年 8 月 10 日)，頁 222~223。

¹² 秦祚譯自〈日本外交檔案 S493 號〉收在黃美真、張雲編，《汪精衛集團投敵》，(上海：人民出版

日政權的新中央政府，但對於新政府首領，日方則要另覓所謂第一流人物，七月十二日的「五相會議」再決議：「起用中國第一流人物，削弱中國現中央政府和中國民眾的抗戰意識，同時醞釀建立鞏固的新興政權的趨勢」¹³。「土肥原機關」總部設在上海虹口公園附近的重光堂，即「重光堂會談」所在地。

土肥原是日本陸軍士官學校步兵科畢業生，畢業後於「參謀本部」工作，民國二年來到中國，與北方軍閥交往密切，民國十七年成爲張作霖的顧問，然同年六月二日竟參與皇姑屯炸斃張作霖，殺死張作霖後土肥原升任關東軍特務機關長，軍銜爲大佐，「九一八事變」後因功再升瀋陽市長，民國二十一年四月因製造「滿洲國」有功再擢升爲少將，接著土肥原再因煽動成立內蒙及冀東的親日政權於民國二十五年升任少將，民國二十七年七月再任「對華特別委員會」委員，直接受內閣「五相會議」指導於上海設立「土肥原機關」¹⁴，於是展開其於中國尋覓「第一流人物」成立新中央政府的工作。

民國二十七年九月下旬，土肥原至上海秘密訪問了唐紹儀進行會談，唐紹儀曾於一九一二年擔任民國的第一任國務總理，土往訪當時唐爲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¹⁵。土肥原與唐紹儀共有兩次接觸¹⁶，這個消息被戴笠偵知，於是下令軍統上海區長周偉龍予以制裁，民國二十七年九月三十日上午，唐於自宅客廳被軍統人員以利斧砍死¹⁷。十月七日的日政府「五相會議」再指示土肥原中將，要他在唐死後將目標轉向吳佩孚與靳雲鵬¹⁸。靳於北洋政府時期兩度擔任國務總理，曾是炫赫一時的風雲人物，但靳對日人以「禮佛有年，無心問事」的話辭謝，土肥原拉攏的重點乃轉向吳佩孚¹⁹，土肥原先派出其屬下大迫通貞少將與吳佩孚接觸，大迫來見吳佩孚，詢問其建立一個中央政府的意見，吳佩孚提出：

要是事變問題由我來調停，也許可以獲得解決 但是進行調停之前希望能發展實力，迫使重慶政府接受這一調停。為此，要招撫華北匪賊，把匪賊編為軍隊，歸我直接指揮，一旦組成基幹軍隊，就建立政府，擴大行政區

社，1984年2月第一版），頁87。

¹³ 日外務省編，《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書(1840~1945)》下卷，1969年再版本，《文書》，頁389~390。

¹⁴ 鄂森，〈土肥原與日本侵華〉，《上海文史資料選輯》，(上海:中華書局出版，1964年5月)，第17輯，頁81。按戰後土肥原遭到盟國的「東京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當作戰犯判處死刑，本文作者爲該法庭「中國檢察官」顧問，資料來自於當時日本政府秘密檔案和證人證辭。

¹⁵ 黃友嵐，《抗日戰爭時期的和平運動》，(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8年8月第一版)，頁87。

¹⁶ 鄂森，〈土肥原與日本侵華〉(法庭證據第2190號)，《上海文史資料選輯》，(上海:中華書局出版，1964年5月)，第17輯，頁109。

¹⁷ 楊者聖，《特工王戴笠》，(台北:新銳出版社，民國83年8月第一版)，頁236。

¹⁸ 外務省編，《日本外交年表並主要文書(下)》，(東京:原書房，昭和41年1月15日發行)，頁284。

¹⁹ 黃友嵐，《抗日戰爭時期的和平運動》，(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8年8月第一版)，頁89。

域，解散臨時政府，蔣介石要是不聽調停，可以把新政府的行政區域擴大到重慶，以此來解決事變問題。

但其中招撫匪賊及取消臨時政府之議遭到日本「華北方面軍」及王克敏等人的反對²⁰。其實吳佩孚是向日方透露想建立自己的軍隊的企圖。

一、儒帥復出、「中統」勸阻

民國二十七年十月近衛首相派親信日本文學家國古護次郎持其親函至北平勸誘吳佩孚出山，吳擬出六項條件，其中包括日方提供建國開辦費五千萬元、顧用日本顧問但規定權限、日軍完全撤出華北等。商談結果日方答應撥建國經費三千萬元，對顧問權限要求設置監政局或總督府，對撤兵問題則稱須俟新國軍訓練完成有能力對抗重慶軍隊時即撤兵，對於這些條件吳佩孚頗為所動²¹。不久土肥原一系之漢奸及吳舊部對吳之包圍不遺餘力，土肥原曾以五萬元交給吳佩孚舊部蔣雁行、趙子賢等賄賂吳夫人張佩蘭及其左右，日方稱無論如何務須於二十八年春，運用合法方式公推吳為總統，吳舊部因此還成立「保定軍事同學會」以收集吳之舊部及其他在野軍人，吳被部下所包圍幾乎有被迫出山之勢²²。土肥原等人還制定了「吳佩孚工作」計劃，由大迫通貞少將負責、和知鷹二大佐、晴氣慶胤少佐、川本芳太郎中佐具體進行²³。

當日方勸進動作頻頻之時，重慶「中統局」立刻電飭其北平站及天津站地下工作人員密切注意，並要他們設法聯絡吳之左右，從中勸阻，甚至必要時勸吳至大後方重慶，免為日方包圍。後來北平站站長后大椿終於成功說動吳佩孚的手下蔣雁行充內線²⁴。蔣雁行是天津人，日本士官學校畢業，民國九年八月曾出任北洋政府參謀次長，吳佩孚避居洛陽時代，蔣雁行於吳手下擔任參謀長與陸軍總長²⁵。「中統」成功說動蔣雁行後，民國二十七年十一月十日重慶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秘書處調查統計局」局長朱家驊經該局北平站站長后大椿之手透過蔣雁行致吳佩孚一電，電文中先述國民政府抗戰意志堅定，再稱讚吳忠肝義膽舉國欽崇，並勸吳「蓄隱光華，為國葆愛」。其實朱之意在言外，要吳不要答應做漢奸

²⁰ 晴氣慶胤，《上海テロ工作七十六號》，（東京：每日新聞社，昭和 55 年），頁 18~19。

²¹ 國史館檔案 抗戰史料 微卷號 27 《中統呈送阻止吳佩孚出任傀儡工作經過專報一冊》，頁 9~10。以下簡稱國史館檔案。

²² 國史館檔案，頁 10。

²³ 土肥原賢二刊行會編（日），天津市政協編譯組譯，《中華民國史資料叢稿譯稿—土肥原秘錄》，（北京：中華書局，1980 年 11 月），頁 56。

²⁴ 國史館檔案，頁 16。

²⁵ 陶菊隱，《吳佩孚傳》，（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8 年 1 月第一版），頁 184。

毀了清譽²⁶。

適於此時陳中孚於十五、十六兩日連訪吳佩孚²⁷，要求吳發通電呼籲和平，陳稱吳通電一發則國府之親日派與中央軍之一部將領亦將響應，吳對陳中孚表示可以考慮但亦提出：「他們既擁戴我，應由他們先發通電才是」，陳連去吳宅兩次，但吳態度冷淡並無結果。十一月十六日吳佩孚請蔣雁行代致朱家驊回電略謂：「我愛國，我設法延宕，中央速示機宜」²⁸，后大椿向朱建議：爲了使吳夫人傾向重慶中央，應贈以鉅款免爲敵誘，且吳佩孚不知重慶到底希望他怎麼做，應請蔣委員長致吳一電作進一步指示，同時爲安蔣雁行之心，應給予若干津貼且應由軍委會給予官銜。十一月十七日后大椿又電重慶稱其正與蔣雁行商量，要求吳佩孚避入東郊民巷使館區以絕日方之包圍，但不知該避入何國使館，請重慶先行洽妥，重慶回電則稱已與美國接洽並送蔣雁行特別費五千元²⁹。

民國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朱家驊再電吳佩孚，希望他能設法到重慶以共籌國事，可笑的是同一時間還在重慶的汪精衛也以國民黨副總裁的身份拍給吳佩孚一個勸電，汪電略謂：

抗戰以來我公養望故都，堅持大義，申正氣而傲奸頑，無任欽佩，近來國際形勢有利於我，英美法平行制裁日著進步，廣州反攻得手士氣大振，深盼我公即時南下表率群倫，蔣委員長躬在前方，未能親致拳拳，特由兆銘抒陳悃忱，敬祈鑒察，並企德音，汪兆銘叩³⁰。

汪精衛表演得太好，然而不到一個月就露餡，汪於十二月十七日逃離重慶，二十九日發表「豔電」，汪精衛成了致吳佩孚電文中所稱的「奸頑」，這是不是也種下了日後引誘吳佩孚合流失敗的心理因素呢？汪如此的反覆能令吳佩孚安心嗎？

民國二十七年十一月中旬，日方再向吳提議成立「中央聯合政府」，元首一職請吳擔任，吳則提出應由民意且不受任何方面之委任，十一月二十一日土肥原又唆使江朝宗等發一聯名通電，擁護所謂「元老」出組中央政府，土肥原一再敦促吳氏向全國通電表示態度，以作其回國之成績³¹。面對土肥原對吳之催逼，於

²⁶ 〈朱家驊致吳佩孚電文—民國 27 年 11 月 10 日〉，國史館檔案，頁 20。

²⁷ 陳中孚爲國民黨要人，國府撤退曾奉命與日和談，後動向不明，民國二十七年曾任「維新政府」顧問。楊天石，〈打入日偽內部的國民黨地下工作者—略談何世楨、陳中孚與陸玄南〉，《抗日戰爭研究》，1991 年，第 1 期，頁 45。

²⁸ 〈吳佩孚託蔣雁行覆電朱家驊—民國 27 年 11 月 16 日〉，國史館檔案，頁 20。

²⁹ 國史館檔案，頁 21~26。

³⁰ 〈汪兆銘致吳佩孚電文—民國 27 年 11 月 21 日〉，國史館檔案，頁 27。

³¹ 國史館檔案，頁 10~11。

是十一月二十二日「中統」北平站電告重慶已開始對吳夫人張佩蘭下工夫，蔣雁行對吳夫人痛陳吳佩孚「出山」之利害得失，並示意重慶中央擬贈以鉅款，張頗欣然並表示將力勸吳與重慶合作，後吳佩孚向蔣雁行等人表示絕對擁護領袖、不當漢奸，並且立書一紙予蔣雁行，委其全權辦理與重慶之聯絡工作，但同時吳又向重慶提出幾個條件，吳要重慶給予某區「軍司令長官」或華北數省軍政長官一類職務³²，且對於重慶建議吳暫避使館區一事，吳認為暫不需要³³。二十三日重慶回電同意請吳擔任「冀察熱遼吉黑六省戰區司令長官」或「冀魯豫察戰區司令長官」，管轄區內之國軍及游擊隊，但要求吳須赴河北或洛陽就職，並策動華北及關外「偽軍」協同諸軍攻取平津。但吳佩孚與其手下商量結果改變主意並給渝方回電稱：

所示各節，肺腑欽佩，思之再四，本應遵命，奈勢不能，請將名義保留，暫勿發表，容從長計議。蔣委員長精神人格素所欽崇，誓當擁護，白(吳化名鄭白)愛國之心尤不後人，決不行傀儡之事，請釋錦注，鄭白叩感³⁴。

二十五日「中統」再請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丁惟汾及監察院長孔德成等電勸吳佩孚，丁等以「保留晚節、敵寇將滅，請南來共襄復興大業」勸告之³⁵。

十二月初「土肥原機關」派出大迫通貞少將親訪吳氏，促其通電表明態度，但吳對日方仍一味敷衍延宕，土肥原再提議請吳佩孚至漢口成立政府以擺脫華北方面軍喜多誠一等之掣肘，吳仍不答應。然而土肥原並不死心，對吳之包圍仍然積極，土肥原尚曾將五百萬元交給陳中孚及吳之樞要處長符定一，囑其運動吳夫人及吳之左右³⁶。對於土肥原的利誘，重慶於十二月六日由蔣中正親致一電予吳勸慰，略謂：「先生興居安善，在狂暴威脅之下而岷立如山，春秋大義，民族正氣，賴先生而益彰，現抗戰軍事雖極艱困，而我軍鬥志卻益堅強，深信長期奮鬥，必復我金甌而後已」³⁷蔣中正之電在強調重慶抗戰之決心與充滿希望，並以此堅吳拒受日誘之心。三天後吳佩孚回覆蔣中正一電，略謂：

我公為民族生存，壯忠不撓，至所欽佩，慨自我國抗戰以來，放棄地帶

³² 國史館檔案，頁 28。

³³ 其實吳佩孚個人有所謂「三不主義」，即不住租界，不積私財，不舉外債。吳佩孚將北平使館區「東郊民巷」也視為外國租界，所以二十八年十二月當德國醫生請其入東郊民巷的德國醫院治牙疾時吳曾堅持不去。見章君毅，《吳佩孚傳(下)》(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 57 年 9 月 1 日初版)，頁 610。

³⁴ 〈吳佩孚致汪精衛朱家驊電〉，國史館檔案，頁 28~29。

³⁵ 國史館檔案，頁 37。

³⁶ 國史館檔案，頁 11。

³⁷ 〈蔣總裁致吳佩孚電—民國 27 年 12 月 6 日〉，國史館檔案，頁 29~30。

受敵蹂躪不堪，謀國多年，值此民族大難關頭，何忍生視敵催逼甚急，唯有設法延宕而已，伏思白久讀春秋，稍明大義，決不甘為敵利用，興作賣國行為，然為解除人民倒懸，保存國府一系元氣計，願以軍民擁護方式，出而與鈞座剛柔相濟，藉收和衷共濟之效，倘蒙鈞座予以諒解，因勢利導，懇即密令放棄區域內各部隊首領，歸白指揮區區此心，未悉我公以為然乎？³⁸

此電文中吳佩孚有責備重慶喪師失地之語，但標舉春秋大義並聲言絕不為日所利用，最後提到願以軍民擁護方式指揮「放棄區域內」各部隊。

然而早在十一月底重慶即已答應吳任「軍政長官」之要求，但當時重慶提出一個條件就是吳須離開北平，吳未答應。此電吳又重提此事但不同的是這次吳要以軍民擁護之方式指揮「放棄區域內」之國軍。這裡可看出吳可能不願離開北平，顯然吳是要在日軍佔領區指揮國軍，重點在他根本不願受重慶節制，而且其軍民擁護之說法又似乎是在呼應日軍的出山勸進，因為這是這陣子日方常對其使用的「把戲」；而其「剛柔相濟」之語更有想擔任重慶與日方之中間人的味道。吳這樣的打算對於日方與重慶都不得罪且還能培植自己的勢力，吳佩孚是想利用重慶東山再起？但重慶也看出了他的企圖。

蔣中正十二月十九日覆吳電，蔣除再提春秋齊桓、夷狄之辨後接著略稱：

其以甘言媚辭獻之先生者，正是其最毒辣之手段，亦是其最窘迫之象徵，非于先生真有所愛戴也，且倭賊全無信義，從不守任何諾言故今日以之勸先生者，仍是一最大之圈套鬼域之中，豈容爾我合唱雙簧乎？若大駕能設法南下，自為國家之大幸，尤為弟所切望，如不易辦，亦乞息影謝客，勿與周旋，此民族之幸也。先生一生行事磊落光明，忠義之氣久而彌彰，故為全國人所崇敬，晚節出處，尤關大局，毋令敵人稱快，而後人讀國史者惜此完人也³⁹。

蔣中正這封信語氣嚴峻，蔣看出吳似乎有先與日妥協再暗中接受重慶番號冀得重慶諒解的意圖，故蔣特別點出「鬼域之中，豈容爾我合唱雙簧」，斷然否定吳的提議，重慶不是不能以官位攏絡，然而吳卻另有打算，這樣看來吳佩孚雖不敢與日本合作但也不想投入重慶懷抱，蔣最後只好提出要吳避門謝客或者直接到重慶來，最後語氣略硬頗有警告他不要晚節不保的意味，這封電文可謂軟硬兼施。

³⁸ 〈吳佩孚致蔣總裁電—民國 27 年 12 月 9 日〉，國史館檔案，頁 30~31。

³⁹ 〈總裁覆吳佩孚電—民國 27 年 12 月 29 日〉，國史館檔案，頁 31~33。

然而日軍方包圍勸進吳佩孚的同時也繼續對靳雲鵬⁴⁰及曹汝霖⁴¹的游說，十二月下旬朱家驊分別致電靳與曹請他們不要與敵人合作。然而此時吳佩孚態度仍然曖昧不明，蔣雁行來電稱吳當前處境相當困難，正苦於不知如何應付日方。因為日方的攻勢一波更甚一波，土肥原交給陳中孚、符定一等五百萬收買吳夫人及吳佩孚左右，再加上十二月底汪精衛出走到了安南以後，曾經打了一通電報給吳佩孚，要求吳佩孚響應其和平運動，吳佩孚也給汪拍了覆電，但是吳之覆電除禮貌性的對汪之和平運動表示肯定外並未有其他表示⁴²，吳對汪精衛的「豔電」雖未加以響應但內心卻起了動搖，吳向蔣雁行質疑：「重慶居然有人主張和平」，蔣為此盡力加以解釋，但吳已產生了觀望態度⁴³。

重慶擔心近衛聲明、汪精衛「豔電」及汪致吳電對吳造成負面影響，於是朱家驊再致吳一電解釋汪精衛之行爲：

上月敵前相近衛宣言表面似甘言誘我，實際欲吞噬全華，夫既曰無領土野心，何以舉傾國之師，侵佔我廣大領土，曰交還租界，廢除治外法權，而一面要求內地雜居，狼子野心，路人皆見 國際形勢日漸好轉 先生處甚難之環境，始終堅持正義，老謀卓識，愛國真忱，凡在國人莫不欽仰，汪先生竟為莠言所惑，離開立場，擅發言論，純系其個人行動，此間一切照常，外界所傳，均非事實⁴⁴。

因應汪精衛的出走，重慶要極力減低其殺傷力。因為汪精衛的「豔電」正是要喚起各地方勢力的響應支持，且吳佩孚當時正是日方極力爭取的對象，汪身為國府第二把交椅竟然投日，勢必對吳佩孚造成心理衝擊，當時甚至流傳著汪之出走事先得重慶諒解之謠言，萬一吳佩孚不察因而對國府失去信心轉而投日那重慶就前功盡棄了。

二、勸誘失敗、土肥去職

民國二十八年一月重慶與日方爭奪吳佩孚的工作進入白熱化階段，元旦重慶行政院長孔祥熙所派的說客劉泗英抵達北平，行前孔曾要劉向天津中央銀行領十萬元贈送吳佩孚。劉為吳佩孚原「八大處」之政務處處長，吳佩孚一見劉就詢問

⁴⁰ 重慶「中統」的天津市黨部主委吳世仁(化名王若僖)，其由二十八年初到六月都不斷在勸說靳雲鵬不要附日。相關資料函電參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朱家驊檔案》，第七十二函：華北黨務：王若僖報告(爭取靳雲鵬案)。

⁴¹ 曹汝霖態度頗傾向重慶，重慶平津地下工作人員曾幾度透過他解救被「日偽」所捕的地下工作人員。相關資料參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朱家驊檔案》，第八十函：北方附逆。

⁴² 金雄白，《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1)》，(台北：李敖出版社，民國77年)，頁98。

⁴³ 國史館檔案，頁11。

⁴⁴ 〈朱家驊致吳佩孚電—民國28年1月〉，國史館檔案，頁39。

汪精衛的「豔電」主和，是否為蔣中正所授意？劉泗英為闢謠外並出示孔祥熙致吳一函，該函再勸其赴重慶並請勿使外界之傳言成真，略謂：「邇來道路流傳，奸人妄思假藉名義，以資號召，遂致愚氓揣疑，謠誑繁興，弟及中樞諸同仁深知先生正氣凜然，不可侵犯，惟念居處困難，輒為懸繫不已 北地苦寒，並望為國珍重。」吳看完後也向劉泗英出示先前蔣中正之電文，然旋即將之撕碎以防日人察覺，吳並請劉轉告蔣：「擁護蔣公，抗戰到底」。一月十日劉攜吳致孔祥熙之回函離平赴渝，吳之覆函稱：「剛柔相濟，古有明訓，似相反而實相成，我兄公忠體國，計當出此！弟處境安如泰山，應付綽有餘裕，請釋遠慮。純剛純強，其國必亡，純柔純弱，其國必削，能柔能剛，其國乃昌。」⁴⁵觀雙方函件，重慶仍擔心外間的謠言及吳的曖昧態度，吳的回函則顯示了吳還是不想到重慶，且其「剛柔之說」與覆蔣中正之電如出一轍，除了為自己的行為解釋外，並似乎暗示其與日本搞和平運動也不是一無可取。但是吳佩孚與重慶的秘密聯絡似乎也讓日方察覺，一月中旬蔣雁行來電稱日方監視日益嚴重，請重慶暫時少賜電，以策安全⁴⁶。

然而吳佩孚這種模稜兩可的態度也讓日方認為還有可為，並決定運用半推半就的方式，一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四日「土肥原機關」與陸、海、外務等省相關人員舉行聯合委員會第三次會議，決議首先向「臨時」、「維新」政府說明起用吳佩孚之狀況，並取得其諒解，然後著手以下工作：由「臨時」、「維新」若干政府要人及在野元老組織「和平救國會」、由救國會懇請吳佩孚出馬任「綏靖委員長」、發表「和平救國宣言」、吳佩孚發表通電，響應近衛聲明接受擁戴，再請吳通電勸告停戰和平、「綏靖委員長事務所」設於開封⁴⁷。於是陸宗輿、江天鐸等四十二人乃組成了「和平救國會」⁴⁸，一月二十四日張燕卿與吳佩孚秘書陳廷傑等人在報上偽造吳佩孚響應的通電，當秘書陳廷傑將該已拍發之電稿呈給吳佩孚時，吳氣得將之怒擲於地⁴⁹。

土肥原立刻派人告訴吳佩孚表示其苦心並謂此次吳倘再不接受，土即無顏回國，即將自殺，幾經接洽吳終於有條件答應⁵⁰。但事後吳密與蔣雁行商談此事，

⁴⁵ 劉泗英原作，張文若提供，〈由重慶潛赴北平勸說吳佩孚經過〉，《傳記文學》，第 67 卷第 6 期，民國 84 年 12 月號，頁 36-37。劉泗英為吳舊部，文中多站在吳立場下筆，故此處僅引孔吳書函內容為主。

⁴⁶ 國史館檔案，頁 36。

⁴⁷ 吳根樑，〈日本土肥原機關的吳佩孚工作及其破產〉，《近代史研究》，1982 年，第 3 期，頁 97。轉引自日本原駐中國大使館檔案，〈關於吳佩孚復出工作之件〉，75-I-199。以下簡稱日本原駐中國大使館檔案。

⁴⁸ 日本原駐中國大使館檔案，〈關於吳佩孚復出工作之件〉，〈關於和平救國會組織之件〉，75-I-199。

⁴⁹ 當時劉泗英尚在北平，此為其說法。見劉泗英，〈息影北平〉收在《吳佩孚先生集》，頁 437。

⁵⁰ 國史館檔案，頁 11。

吳決定二十六日向日方提出三個出山條件：第一須給以下三個職權：1.和平救國政府主權。2.和平救國軍總司令。3.和平救國委員會總裁；第二日本要撤兵；第三允許吳組織實力。二十五日當晚吳將條件開給土肥原⁵¹，一月三十日「和平救國宣言」正式公佈於世，敦請吳佩孚出任「綏靖委員長」⁵²，土肥原並安排吳佩孚一月三十一日於自宅召開記者會，並事先代吳擬好回答記者問題的書面稿，吳佩孚答應召開記者會，然而卻有自己的盤算⁵³。

面對日方與吳佩孚幾乎要達成協議的局勢下，「中統」天津站負責人兼市黨部主委吳世仁立刻派人去勸告吳佩孚，吳世仁並於一月二十八日向朱家驊報告狀況，吳稱「連日敵報發表其自造之津滬各團體各名流擁吳通電甚多，吳有覆三電，亦表示中日鬩牆非計，願隨各方盡力和平等語 吳正凝視天意民意，為風為雨，數日可定。」⁵⁴一月二十九日蔣雁行亦電朱家驊：

近來東鄰對白公嚴逼脅迫日益加緊，高壓程度已達極點，益以海內人士敦促之電，有如雪片飛來，大有風起雲湧之勢，白公既擺脫之乏術 左右被運動，將往日被宵(蔣雁行化名凌霄)阻止之數電立主發出，宣示於報端，白公處境已無可如何 微我不才，既負委座託咐之重，復失執事囑望之殷 冀圖諒解⁵⁵。

由這封電報可看出，吳佩孚響應救國會之通電並非吳之本意，但由於蔣雁行電文中對挽回吳佩孚感到悲觀失望，於是重慶加委蔣雁行為「軍委會參議」要其繼續努力。然而連續接獲吳世仁及蔣雁行的報告讓重慶對吳佩孚失望透頂，數月來的工作面臨失敗，於是重慶另一方面也萌生殺掉吳佩孚的想法，朱家驊於一月二十九日回電天津吳世仁：「如鄭白(吳佩孚)無可挽回，希即予嚴厲制裁。」⁵⁶也許重慶要看最後記者會的結果，如果記者會後吳確定要出山、無可挽回，那麼重慶就要對吳佩孚動手了。

一月三十一日上午，吳自宅「什錦花園」車水馬龍，二、三百名中外記者濟濟一堂，十二時吳出臨大廳發表演講，但是最後日方所提供之書面宣言吳並未理

⁵¹ 國史館檔案，頁 12。

⁵² 日本原駐中國大使館檔案，《和平救國會宣言》，75-I-199。

⁵³ 按劉泗英之說法，吳答應召開記者會是要藉此表明抗日拒和態度。劉泗英，〈息影北平〉收在《吳佩孚先生集》，頁 432。

⁵⁴ 〈吳牛天津電朱家驊—民國 28 年 1 月 28 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朱家驊檔案》，第八十函：北方制裁(制裁漢奸)。吳牛即吳世仁。

⁵⁵ 〈蔣雁行北平電朱家驊—民國 28 年 1 月 29 日〉，國史館檔案，頁 40。

⁵⁶ 〈朱家驊電天津吳世仁—民國 28 年 1 月 29 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朱家驊檔案》，第八十函：北方制裁(制裁漢奸)。

睬，吳自顧自地當場宣佈：

余受和平救國會之推薦，組織綏靖委員會，著手準備建立政府機關，以實現和平。第一階段當先編成作為骨幹之軍隊，為此，余打算首先使華北游擊隊歸順。若在華北鞏固了地盤，則可在日華之間實行武力調停，解決事變，因為武力調停，余在國內戰爭中已有數次經驗，所以對此是有自信的。我只要組成政府後被提名為候選人，三十萬人上下的抗日軍隊會立即響應，這將在重慶政府內部產生很大動搖⁵⁷。

吳又說：「我吳某人一生反對國民黨，但此乃我中國人自己家中事，不容外人干涉，今請日人退出中國，將東北交還中國，我吳某人自會率軍反蔣，與國民黨作戰也⁵⁸。」除此之外，吳佩孚還提出要得到充分的主權，吳的臨場反應讓中外記者及日方愕然，記者會結束後，因吳未按日方所擬原稿談話，外國記者電報都被扣留，並由日方「同盟社」拍發日方原擬之談話稿⁵⁹。於是由於新聞被封鎖，各大報都刊載吳已經落水的消息。由於吳佩孚沒有按照日方的談話稿發表宣言，使得吳與日方的設想有差距⁶⁰，首先日方的所謂中央政府是要讓各地區保持自治權的，且日方要吳佩孚以開封及武漢為根據地，在「臨時」、「維新」兩政府管轄之外的河南、湖北、湖南、四川、雲南、貴州等省份進行其招撫土匪的綏靖工作⁶¹。再者日本「華北方面軍」原只同意吳佩孚在不屬於「臨時政府」之轄區從事招撫匪賊的工作，而吳的綏靖工作卻要以整個華北為範圍，吳的作法會影響到王克敏所代表的「臨時政府」及其支持者「華北方面軍」的利益。「華北方面軍」要吳取消其記者會之談話，吳不答應，「華北方面軍」極為不滿⁶²，亦即是吳佩孚是要做新政府之領袖，要求更大自主權但日方卻只要他做「地方性領袖」，於是在「華北方面軍」及「臨時政府」掣肘下，日方無法配合吳佩孚的要求。

記者會結束後的二月，「華北方面軍」越級電告東京大本營，電文內容是吳佩孚無實力卻妄自尊大，背信忘義，擾亂華北治安，倘若成立以他為首的新政府

⁵⁷ 晴氣慶胤，《上海テロ工作七十六號》，（東京：每日新聞社，昭和 55 年），頁 22。

⁵⁸ 王曰叟，〈吳佩孚軼事〉（自由時報，61 年 4 月 1 日）收在朱傳譽主編，《吳佩孚傳記資料（一）》，（台北：天一出版社，1979 年 11 月），頁 117。據作者言該說法出自參與該記者會之記者。

⁵⁹ 民國 28 年 2 月 2 日重慶中央日報曾揭發其底蘊。見吳佩孚先生集編輯委員會，《吳佩孚先生集》，（台北：吳佩孚先生集編輯委員會，民國 49 年 3 月 20 日出版），頁 452。

⁶⁰ 民國 28 年 4 月上海《良友畫報》曾如此報導：「一月三十日日方迫使吳氏在北平公開接見記者，並代為準備談話稿，然吳氏接見時所談內容與預定原稿完全相反，且提出三項條件，謂非此不能真正和平，外國記者咸為驚愕不已。」《良友畫報—吳佩孚之謎》，第 141 期，民國 28 年 4 月號，頁 16。該報還刊出吳接見記者之照片。

⁶¹ 日本原駐中國大使館檔案，《關於吳佩孚出馬問題之件》、《關於和平救國會組織之件》，75-I-199。

⁶² 晴氣慶胤，《上海テロ工作七十六號》，（東京：每日新聞社，昭和 55 年），頁 22~23。

必有害無益⁶³。「華北方面軍」的反對讓土肥原甚為苦惱，但土肥原並未死心，二月十日再派大迫通貞與吳晤面，吳謂不願作虛偽之和平，且痛批日方新聞記者偽造消息有損其人格⁶⁴。三月初大迫再見吳佩孚，敦請吳趕緊至開封就「綏靖委員長」一職，吳表示日既未撤兵，並無和平可言，赴汴(開封)時機未至，大迫告吳：「國民政府現派暗殺團多人謀刺將軍，日方擬派憲兵一大隊駐府保護。」吳聞後大怒曰：「余生平只有保護他人從未受人保護，你們日本將來或許由吾保護」這話講得不卑不亢卻太過突兀，甚不給大迫面子，大迫不得結果而辭去⁶⁵。大概大迫已知道重慶的暗中運作影響吳之決定，或者擔心吳被重慶制裁以致前功盡棄，於是日方派人「保護」吳佩孚。

幾天後土肥原為挽救面臨失敗的「吳佩孚工作」遂再派符定一謁吳⁶⁶，土肥原透過符定一傳達決定予吳一部份實權，並請吳推薦兩位華北省長人選，吳大約知道日方內部意見之分歧，於是吳提出請土肥原帶日本天皇國書來談⁶⁷。雖然吳佩孚一直不願按照日方的安排至開封任「綏靖委員長」，但日本政府對吳並不死心，決定先解決日本內部對「吳佩孚工作」之歧見，二月，今井武夫奉命至北平調解「土肥原機關」與「華北方面軍」及「臨時政府」之間的對立關係，日本政府也一再訓令「華北方面軍」喜多等人與土肥原合作⁶⁸，但其實今井個人對「吳佩孚工作」亦不贊同，今井認為扶持舊軍閥是不得民心的，然而三月中旬土肥原仍決定親謁吳佩孚做最後之努力，土見吳後，吳向土肥原提出條件五項：「(一)劃冀魯豫晉察綏蘇皖鄂等九省為實力範圍 (二)由吳練兵五十萬 (三)槍械經費由日方供給 (四)簽定中日防共協定 (五)日軍退出上述九省。」土肥原對三、五兩項頗感為難，因為「華北方面軍」絕不可能同意⁶⁹。於是至此土肥原對「吳佩孚工作」徹底感到失望，最後接受今井勸告停止工作另調新職，遺下的「土肥原

⁶³ 晴氣慶胤，《上海テロ工作七十六號》，(東京：每日新聞社，昭和 55 年)，頁 16。

⁶⁴ 〈任致遠北平電—民國 28 年 2 月 18 日〉國史館檔案 抗戰史料 檔號 0160.52 3124.02 微卷號 406，頁 1932。

⁶⁵ 〈張志華天津電朱家驊—民國 28 年 3 月 17 日〉國史館檔案 抗戰史料 檔號 0160.52 3124.02 微卷號 406 頁 1934。

⁶⁶ 符定一曾為毛澤東老師，當時為吳佩孚幕僚，吳死後符定一轉投重慶，為重慶「中統」策反華北「偽軍」，有關其為重慶秘密工作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朱家驊檔案》，第六十七函：北方零件(符定一個人卷)。抗戰勝利後符定一轉投中共，後擔任「紅朝」的第一任中央文史館館長。見楊輝，〈毛澤東與老師符定一〉，《黨史博覽》，2002 年 8 月。

⁶⁷ 〈任志遠北平電朱家驊—民國 28 年 3 月 15 日〉國史館檔案 抗戰史料 檔號 0160.52 3124.02 微卷號 406，頁 1933。

⁶⁸ 國史館檔案，頁 14。

⁶⁹ 〈任致遠北平電朱家驊—民國 28 年 4 月 1 日〉國史館檔案 抗戰史料 檔號 0160.52 3124.02 微卷號 406，頁 1937。

機關」由大迫通貞及川本芳太郎中佐繼續運作⁷⁰。

三、拒見汪氏、合作破局

「土肥原機關」從一月至三月的攻勢最後終沒能促使吳佩孚出山，並導致土肥原之去職，重慶在這場搶人大戰中暫時算是小勝，可以鬆一口氣，「中統」的勸告必定發揮了不小的作用，但這只是重慶與日方對「吳佩孚工作」角力戰的第一回合，雖然日方對吳佩孚的拉攏是失敗了，但是拉攏汪精衛的工作卻順利的進行著，等到汪精衛由河內脫走後，日本政府已決定將「吳佩孚工作」與「汪精衛工作」合流，實行「汪、吳合作」的計劃，於是這一回合，重慶面臨更嚴峻的挑戰，如果讓汪精衛和吳佩孚真的造成「南北合作」，則將對國民政府造成非常大的傷害。所以「中統」只能再接再厲了。到了四月雖然土肥原已經去職，但因應汪精衛的出走，日方對吳佩孚又產生希望，並未停止「吳佩孚工作」，大迫乾脆派出陳中孚等人先至漢口籌組政府，十七日陳中孚等電請吳佩孚指示組織政府辦法，準備請其擔任元首，吳閱電後執之於地，並謂陳中孚等人之行動與其毫無關係，其絕不做任何人之傀儡⁷¹。四月下旬「中統」開封區的工作人員成功說服偽軍孫殿英部，讓孫殿英派部屬馬子驥化名李守信者密赴北平佯裝投敵，五月馬子驥利用孫殿英名義與「華北方面軍」將領杉山、喜多、大迫等時相往還，馬子驥最後竟能取得「華北特務機關」之證明書，得以出入重要場所，馬並說服吳佩孚外甥與女婿，得以聯絡吳之左右，勸阻吳佩孚⁷²。

然而日方也正積極運作著，五月間日本對於使「吳、汪工作合流」有更具體的決定，五月十七日陸相坂垣征四郎聽從土肥原之建議，終於採納「汪吳合作」方案，五月十八日，參謀本部第八課起草關於樹立新中央政府之文件，其名稱爲「汪吳工作指導腹案」⁷³，同月內閣作出決定：「將爭取吳佩孚工作改為促進『汪、吳合作』，以建立汪吳聯合的『中央政府』」⁷⁴，也就是日本的方針是將未來的新中央政權造成汪吳聯合體，並未準備專寵汪一人⁷⁵。五月二十六日，日本駐上海總領事佐藤在致大使館參事官堀內的一份電文，可說明爲何日本要進行「汪吳合

⁷⁰ 今井武夫著，天津市政協編譯委員會譯，《今井武夫回憶錄》，(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7年8月第一版)，頁106~107。

⁷¹ 〈任致遠北平電朱家驊—民國28年4月27日〉國史館檔案 抗戰史料 檔號0160.52 3124.02 微卷號406 頁1940

⁷² 國史館檔案，頁17。

⁷³ 〈汪政權樹立工作(節譯自日防衛廳防衛研究所戰史室)〉收在黃美真、張云編，《汪精衛國民政府成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第一版)，頁37。

⁷⁴ 日本原駐中國大使館檔案，《吳佩孚工作》，75-I-199。

⁷⁵ 馬振驥，〈吳佩孚蓋棺不能論定〉，《國史館館刊》，復刊第22期，頁122。

作」，該電稱：「隨著汪兆銘和平工作的進展，應再次考慮吳佩孚的起用問題，汪在政治上力量，在武力上也有背景，但在華北及湖南、四川等地，汪的勢力卻不及吳佩孚，因此汪吳合作對於解決時局是有利的，日本政府當斡旋於汪吳之間，促成他們的合作」⁷⁶，也就是日方認為吳佩孚在華北等地的勢力可彌補汪精衛在該地號召力不足的問題。

於是日方再加緊勸說吳佩孚的工作，由五月至六月中，雙方接觸多次，但吳佩孚仍強調主權問題，要求更大之自主權，故未有實質進展⁷⁷，然而此時汪精衛乘坐「北光丸號」在影佐禎昭及犬養健等人護航下，已於五月六日由河內抵達上海虹江碼頭，當天汪精衛在「北光丸號」上與今井武夫展開會談⁷⁸。日方又派出中國通坂西利八郎赴上海與汪會議，解決汪、吳出任之條件問題⁷⁹。於是為探明吳佩孚之態度以及增加自己之政治資本，汪精衛乃於五月二十二日請上海申報記者趙叔雍攜二函至北平及天津分致吳佩孚、曹汝霖，其中致吳佩孚之函略謂

子玉先生勛鑒：去歲冬間曾致電左右 幸蒙鑒察，旋奉覆電 中日兩國為敵則兩敗俱傷，為友則共同發達，其理至明 銘自臘之未發表豔電，棲遲河內，未嘗別有謀劃，蓋以此身曾參與重慶政府，雖諫不從，言不聽 不憚再三呼籲，以期重慶當局之最後覺悟，今此望已絕，不得不易地奔走，期與海內豪俊，共謀挽救，現在國難日深 非恢復和平，無以內除共禍，外應世界大勢，非組織統一有力自由獨立之政府，無以奠定和平。公老成謀國，如有所示，極願承教 特託趙叔雍先生趨前面陳⁸⁰。

由信中可知這封信是汪精衛二度與吳聯繫，該信在試探吳佩孚對組織政府的意見。六月初，趙叔雍抵北平除將該函送交吳佩孚外，趙並告訴吳稱汪精衛現正與日方研討和平具體條件中，新政府預定在本年秋間成立，但須預先將南京、北平、漢口、廣州各親日地方政府分別調整組織後始能實現。吳的回應是：「如汪先生有具體適當辦法，自當樂從，惟恐為時尚早耳。」趙再持另一函赴天津謁曹汝霖，曹回稱：「我對現局無辦法，無能為汪先生助力。」⁸¹。

⁷⁶ 日本原駐中國大使館檔案，《吳佩孚工作》，75-I-199。

⁷⁷ 日本原駐中國大使館檔案，《吳佩孚工作》，75-I-186。

⁷⁸ 蔡德金、李惠賢編，《汪精衛偽國民政府紀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年7月第一版)，頁19~20。

⁷⁹ 〈朱紹良陳敵擬約汪精衛吳子玉出組偽府之佳電—民國28年6月9日〉(錄自總統府機要檔案) 收在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編印，《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 第六編 傀儡組織(三)》(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民國70年)，頁151~152。

⁸⁰ 《吳佩孚先生集》，頁439~440。

⁸¹ 〈端木納天津電朱家驊—民國28年6月14日〉國史館檔案 抗戰史料 檔號0160.52 3124.02 微卷號406，頁1946。

大約吳佩孚一時對汪精衛能否與日本達成協議，最終組成政府不無懷疑，故無置可否，暫持觀望，至於曹汝霖則前已略述其心向重慶更不可能與汪精衛結合。六月七、八、九三日吳佩孚分別回覆三函于汪，趙將該三函電陳已赴東京的汪精衛，該函略謂：

精衛先生執事：叔雍先生至，拜展手書，讀竟愴感不置，中日輔車相依，為敵為友，利害本自昭然 吾國自甲午燬師，庚子喋血，迄於九一八事變，隱忍依違，專以不茲生事端為無上自全之策，敷衍因循，正如癰瘍附身，終歸一潰，而又內外情形複雜，因風縱火，更有促使熾燃者，平情論事，國民黨不過適逢其會，儻亦國運有以致之，不必盡在人也。公怵惕危亡於喧燹之中，逕議寢兵 冀返眾迷，終且險患親嘗，高振六翮 為國忠貞，至堪欽佩 竊謂中華民國四萬萬民眾，實為主體，民意歸趨，果以抗戰為然，則任何犧牲，均可弗計，若民皆厭戰，相戰之國復有感於窮兵黷武之非，即宜矜恤同胞，戛然而止，有史以來，從無久戰不和之理，弟分屬軍人，昔亦誤以武力為萬能 故自蘆溝橋變起，兀坐故都，本所信念，日以啟導和平為事，和平要領，則以保權國土恢復主權為唯一之主張，區區此志，竊幸與公尚有鍼芥之合 尊論謂非組織統一有力自由獨立之政府，無以奠定和平，確為扼要之言，與鄙見亦正相符 弟委質國家，誓與國家生存同其命運，苟能山河無恙，自計已足，幸叨不棄，更當進附賢者，謁畢忠忱，如能教益頻施，資為鍼圭，更所欣盼而不容自己者也 吳佩孚拜啟 六月七日⁸²。

近來大陸學者寫翻案文章，以檔案為基礎，精闢細膩的分析吳佩孚與日人交手經過，但卻認為吳佩孚這三封信「貶低抗戰，蔑視國民黨政府」吳且「誣罵抗戰為窮兵黷武」⁸³。這樣的看法似有進一步探討之必要，因為若細究三函前半部，吳說明中日會導致大戰其實是自從甲午戰爭以來，歷來政府對日本的「隱忍依違，專以不茲生事端為無上自全之策」，再加上「內外情形複雜」，所以若說吳蔑視國民政府，那他也同時批評了滿清及北洋政府以及當時內外局勢，焦點似乎不全在國民政府身上，且吳甚至還替國民政府說話稱：「平情論事，國民黨政府不過適逢其會」，意思就是國民政府只不過運氣不好，而以下雖有稱讚汪精衛主和的話，但似乎也頗像禮貌性的應酬話，對於抗戰或和平，吳提出以民意為依歸，似亦看不出他贊成那一邊，而其文中雖說「尊論謂非組織統一有力自由獨立之政

⁸² 《吳佩孚先生集》，頁 441~442。

⁸³ 馬振犢，〈吳佩孚蓋棺不能論定〉，《國史館館刊》，復刊第 22 期，頁 126~127。

府，無以奠定和平，確為扼要之言，與鄙見亦正相符」，這樣可以說他似乎站到汪精衛這一邊，但推敲其言他是贊成組成「統一有力獨立之政府以奠定和平」，卻也並未直言贊成由汪精衛組織政府，最後吳於信中又說「苟能山河無恙，自計已足」，這卻也好像暗示汪精衛，其對於政治已無太大企圖，當然這也有可能只是拒絕汪的應酬話，總之整封信好像並未給汪任何承諾，所以這封信倒也頗像一封禮貌性的回函。吳佩孚處在敵人環伺的境地下，似亦難以對和平運動表現太強硬的立場，相反的他還須表達某種程度的不反對，而事實上當時抗戰軍事形勢一面倒，抗戰前途暗淡(太平洋戰爭一年半以後才發生)，一般人對和平運動應該都不致太排斥，重點是到底在什麼狀況下和談？

然而「中統」對吳佩孚的勸說仍在進行著，汪精衛派趙叔雍攜函見吳佩孚之事，「中統」人員都一一回報，六月中旬蔣雁行電稱連日來為應付汪日，勸阻吳出山極為辛苦，鑒於汪對吳的動作頻頻，為鼓勵蔣雁行等人繼續勸阻工作，重慶先發給蔣特別活動費五千元，朱家驊並再次致電鼓勵吳佩孚。朱電稱：

北平吳子玉先生道鑒 前日英國駐華大使來渝，盛稱先生愛國真誠，忠貞不貳 邇來各方情勢，於我益形有利 敵勢已成弩末，到處遭我痛擊 英美法之團結，將抵於成，對於日本已予以莫大之威脅，倭人四顧徬徨，竟不敢參加德義之軍事同盟 最後勝利之到來，為期已屬非遠 乃竟有人狃於和平之論，倡為和平之議，奔走營謀，甘為敵用 先生明鑒古今，熟稔成敗，對於此等自誤誤國之徒，自必不屑瞻顧，尚願力闢莠言，堅維古道，正人心於一旦，標大義於千秋⁸⁴。

朱家驊這封勸告信顯然是衝著汪精衛而來，朱並正告吳稱重慶已得國際援助，抗戰形勢大好，朱的意思講白一點就是，他要吳不要選錯邊押錯寶了！后大樁將該電託蔣雁行轉交吳佩孚，據蔣稱吳看完電文後，態度甚好，並表示始終不與重慶對立，目前對日本之一切不過一種應付而已，然而吳又提到對於「出山」一事離事實尚遠，即使他日勢成騎虎，亦將於事前電呈重慶徵求意見，絕不違背國策⁸⁵！吳所提對日本都是在應付而已，這點是在向重慶解釋他仍和汪日接觸的原因，避免重慶對其做出諸如制裁等激烈舉措，然而吳卻又提到對於出山一事離事實尚遠，這麼說來吳似乎只是因為時機未到而並不完全排斥與日談和，接下來吳又稱就算不得已須出山也會先徵求重慶之意見。吳是不是在傳達訊息給重慶，

⁸⁴ 國史館檔案，頁 43。

⁸⁵ 國史館檔案，頁 44。

他本人不會逾越重慶的底限，但若要他與汪日斷絕來往是無法辦到的，他要保持自身行動的靈活性。由重慶角度看來，吳又在施展其模稜兩可的戰術，吳雖不容易投入日本懷抱但也不會完全聽命於重慶，所以重慶對他的監視及兩手策略(勸告與制裁)仍不能放鬆。

在汪精衛與吳佩孚一方面，趙叔雍傳回的吳佩孚意見，吳的態度既消極又冷淡，趙叔雍離開吳宅後，吳對旁人謂汪先生比他有辦法，用不著他幫忙，且告訴他的親信謂汪如出任首領，吳絕對不願在其下任職⁸⁶。五月二十二日汪精衛託趙叔雍致函吳佩孚之後，可能出於吳對汪函無回應，五月二十七日，汪精衛曾再度請陳中孚攜汪函赴北平見吳，六月十日吳佩孚亦曾回覆該函稱：「頃中孚兄北來，再奉琅函，過承獎掖，感愧交並 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 但期確能救國，與彼此共同宗旨，不相違越，自當審度情形，與公同進止也。」⁸⁷此時汪精衛已到日本，陳乃將該函電陳汪精衛，然而陳中孚此行還負有與吳佩孚商談合作條件的任務，早在陳奉汪命赴北平前，汪精衛、陳中孚、趙叔雍等曾與日方大迫通貞、影佐禎昭等人商議「汪、吳合作」條件，汪等人商談結果如下：由汪任元首，吳則以招撫使名義專任軍事，沿用青天白日旗及國民黨時代一切名稱，屆時與日媾和⁸⁸。陳中孚將之告知吳佩孚，吳卻對陳提出下列要求：1. 吳對外發表政見，汪須採納；2. 汪不得干涉軍事；3. 汪不得私與他國簽訂任何條約；4. 汪施政方針須得吳同意⁸⁹。

表面上看來汪吳二者似乎越來越有交集，吳覆汪函既稱「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吳，汪雙方代表陳中孚會談雖開出許多條件，但就其條件看來似乎不排斥負責軍事方面。於是六月十八日大迫通貞與吳佩孚日本友人岡野增次郎再赴北平勸進吳佩孚，但是此時吳佩孚的條件卻變了，吳的胃口大開，吳對大迫提出：「成立『和平救國會』以我為總統，政治、外交、軍事須完全獨立自主，總統內閣地位，須與日本天皇及日內閣地位相等，顧問一層，應為僱用性質。」此外，吳還提到要接收「臨時」及「維新」兩政府。吳不但要做總統還要和主子平起平坐！

⁸⁶ 〈張志華任致遠天津電朱家驊—民國 28 年 6 月 17 日〉國史館檔案 抗戰史料 檔號 0160.52 3124.02 微卷號 406 頁 1950。

⁸⁷ 馬振犢，〈吳佩孚蓋棺不能論定〉，《國史館館刊》，復刊第 22 期，頁 127。轉引自丁小強、吳根樑譯〈吳佩孚工作檔案資料—覆汪兆銘函(1939 年 6 月 8 日)〉，《中華民國史資料叢稿》專題，(北京：中華書局，1987 年 7 月)。按此處史料應是譯自日本駐中國大使館檔案。

⁸⁸ 〈任致遠天津電朱家驊—民國 28 年 6 月 29 日〉國史館檔案 抗戰史料 檔號 0160.52 3124.02 微卷號 406 頁 1956。

⁸⁹ 〈顧祝同陳陳中孚代表汪與吳佩孚商談合作之寢電—民國 28 年 6 月 26 日〉(錄自總統府機要檔案) 收在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編印，《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六編 傀儡組織(三)》(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民國 70 年)，頁 152。

事後岡野增次郎提到，日本政府對於未來中國中央政府的構想是「汪七吳三」，而吳之想法卻是「吳七汪三」⁹⁰。雙方的設想差距頗大，吳又告訴大迫幾天前陳中孚曾代表汪精衛來談合作問題，但目前吳都尚在考慮之中，大迫離開後，吳佩孚隨即與蔣雁行商議應付辦法，蔣雁行乘機將汪精衛過去反覆無常事實列舉告吳，請其勿與汪合作，後吳對蔣稱：「汪之人格，余亦盡知，彼此次欲與我合作，不過利用一時，余正計議運用辦法」⁹¹。大約吳佩孚根本不願意與汪精衛合作，而且吳不斷提出主權、撤兵及擔任首領之條件，這些都是日方及汪精衛無法答應的，吳這樣提應該是故意要讓汪日知難而退，當然重慶「中統」北平站及天津站地下工作人員也發揮了一定作用。

民國二十八年五月三十一日汪精衛乘日本軍用飛機由上海抵達東京，六月五日日本陸軍省和參謀本部聯席會議做出決定，其中有「汪精衛在建立中央政府的過程中應與吳佩孚及臨時、維新兩政權合作。」⁹²六月六日日本「五相會議」決定：「新中央政府以汪精衛、吳佩孚、現有政權、改變主意的重慶政府等為其構成份子」⁹³。在日本期間汪精衛收到趙叔雍與陳中孚所電吳之覆函，尤其汪看到吳在信中稱：「二人同心，其利斷金」，汪遂向日人誇稱其可說服吳佩孚出而與之合作⁹⁴。再者，汪精衛已得到日方支持成立新政府承諾，但鑒於華北「臨時政府」及華中「維新政府」將來在新政府中扮演之角色問題以及與吳佩孚合作之事宜，於是汪精衛在影佐禎昭、須賀彥次郎、清水董三、犬養健等人陪同下，於民國二十八年六月二十四日抵達天津，汪至天津後隨即訪問了日軍司令官多田駿，二十五日及二十七日汪精衛兩度會見「臨時政府」行政委員會委員長王克敏⁹⁵。

汪精衛飛北平前，二十四日，日人岡野增次郎來見吳，請吳於汪精衛抵北平後赴顧維鈞宅與汪會面，吳表示極為歡迎汪之來平，但「按中國之禮儀作法，應為『行客拜坐客』，即在平等地位上之主客訪謁」，「乞來敝舍一晤最為妥當」⁹⁶。

⁹⁰ 馬振犢，〈吳佩孚蓋棺不能論定〉，《國史館館刊》，復刊第 22 期，頁 124。轉引自丁小強、吳根樑譯〈吳佩孚工作檔案資料〉，《中華民國史資料叢稿》專題，（北京：中華書局，1987 年 7 月），頁 12~13。

⁹¹ 國史館檔案，頁 15。

⁹² 蔡德金、李惠賢編，《汪精衛偽國民政府紀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 年 7 月第一版），頁 20。

⁹³ 秦祚譯，〈日本外交檔案 S493 號—樹立新中央政府的方針〉收在黃美真、張云編，《汪精衛國民政府成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年 4 月第一版），頁 86。

⁹⁴ 〈侍從室香港情報—民國 28 年 7 月 1 日〉國史館檔案 抗戰史料 檔號 0160.52 3124.02 微卷號 406 頁 1969。

⁹⁵ 邵銘煌，《汪偽政權之建立及其覆亡》，（台北：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民國 79 年 6 月），頁 102。

⁹⁶ 馬振犢，〈吳佩孚蓋棺不能論定〉，《國史館館刊》，復刊第 22 期，頁 127。

吳認為汪是客人應該來吳宅拜見主人，吳似乎不認為汪地位於其之上。二十六日大迫偕陳中孚及符定一等人再來見吳，大迫等人向吳提及汪不日將飛平晤吳，共策國事，吳當時未置可否，大迫等卻解讀為吳佩孚已答應見汪精衛，乃電天津請汪精衛立刻至北平與吳晤面。吳佩孚於大迫等人走後與其秘書叢大經等人商量應付辦法，叢大經是中統天津站佈置於吳身旁之另一內線，化名「金權」⁹⁷。吳佩孚告訴叢大經：「汪既赴東京來平，必允敵若干條件，余決避免與其晤談。」叢大經乘機向吳說明汪精衛反覆無常賣國求榮之劣行，吳點頭微笑⁹⁸。於是商量結果決定不與汪精衛晤面，但大迫等人早已認定吳佩孚答應見汪，為防節外生枝，大迫於二十七日早晨派日憲兵八名，以保護為名赴吳宅威脅監視，吳大為不滿。汪遂偕周佛海、高宗武及影佐禎昭、今井武夫等於二十七日早晨乘機抵北平，汪本欲逕赴吳宅與之會晤，吳佩孚乃稱病拒絕，汪在機場等候至九時仍得不到吳之回覆，汪只得進城住鐵獅子胡同原顧維鈞宅，顧宅當時已成為日軍山下奉文參謀長公館⁹⁹，晚上五時汪赴喜多誠一公館宴敘，到者有杉山、喜多、大迫及王克敏、周佛海、高宗武、陳中孚等人，汪於會後仍回住顧宅¹⁰⁰。汪直到最後並未能與吳佩孚見面，吳佩孚大概是擔心汪精衛與日本人訂有密約，吳不能落入圈套被日汪宰割。

然而雖然汪吳會面不成，日方還是對吳不死心，七月間吳佩孚之日本友人岡野增次郎還多次就「汪吳合作」事來見吳¹⁰¹，吳曾對岡野說：「日本有日本之立場，中國有中國之立場，日本專斷強迫中國接受其立場則為不可。」岡野要吳赴日訪問被吳拒絕，吳又對岡野極盡敷衍之能事，吳對岡野之說詞不外是：

于汪氏終究未能收拾起時局之際，余始出山亦無不可，時機成熟則全力以赴，願為日中兩國而盡力也……閣下宜從長計議而不宜操之過急……余信守欲速則不達之格言，操之過急則於事無補，只要能達到最後目的，足矣。此亦恰如余之出山問題，不可焦急，不久水到渠成之時將至也。

⁹⁷ 化名「金權」的叢大經者，由民國二十八年五月至十二月吳佩孚去世，期間總計由重慶「中統」領取了二千四百元的「津貼」。見國史館檔案，頁 45。

⁹⁸ 〈吳世仁天津電朱家驊—民國 28 年 7 月 2 日發電〉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朱家驊檔案》，第六十六函：平津黨務工作報告。

⁹⁹ 山下當時為「北支那方面軍參謀長」，奉命保護汪氏。見高拜石，〈吳子玉克保晚節〉（台灣新生報，民國 67 年），收在朱傳譽主編，《吳佩孚傳記資料(二)》，（台北：天一出版社，1979 年 11 月），頁 47。

¹⁰⁰ 〈任致遠北平電—民國 28 年 7 月 2 日〉國史館檔案 抗戰史料 檔號 0160.52 3124.02 微卷號 406 頁 1962。

¹⁰¹ 岡野增次郎與吳佩孚是舊交好友。參見岡野增次郎，《吳佩孚》，（東京：大日本精神修道場萬聖閣，昭和 14 年 4 月 25 日）。

吳佩孚採取了拖延及敷衍戰術。七月二十九日日方再要求吳以最高軍事首長身份，立刻與汪合作，吳索性答以：「於今不再念及武力矣」。八月十日，岡野要吳對汪精衛的和平運動正式表態，吳一改緩和態度開始批判汪精衛：「汪精衛言論甚雄 而昧於中國民意之動向」。吳又當日人之面褒蔣批汪：「他表示要與我合作，已多次轉達此意 我願開誠佈公的表態，惟在日軍監督之下組織御用政府之形式，到底不容老蔣在支那大眾，特別是中青年層中的人心。」¹⁰²。吳竟直呼汪政府將為「御用政府」。

吳佩孚從一月底記者會上稱只要日軍退出中國並交還東北，願為日人率軍與國民黨作戰，至此時八月吳之態度丕變，不僅公開批判汪精衛並讚美蔣中正，且露骨的暗示擬成立的汪政權僅為一傀儡耳。吳對汪日之態度相信應該會讓日人大為不滿，日人會不會在不耐煩之下，像一月間的重慶一樣動了殺機？此時重慶方面又有些什麼反應呢？「中統」於汪精衛二十四日抵達天津後即密切注意汪吳動向，「中統」天津站人員張書城告訴天津站兼「華北黨政軍辦事處」負責人吳世仁，張稱其自願制裁汪精衛，張擬利用過去與「改組派」有關之忠實同志設法打入，趁機對汪制裁¹⁰³。七月十八日白崇熹曾致蔣中正一電，報告汪欲與吳會面被吳拒絕，汪運動吳之事已宣告失敗¹⁰⁴，而且就在七月間蔣中正也曾再致吳佩孚一電嘉勉，旋得吳一覆電，該電稱：

蔣委員長鈞鑒，陽電奉悉 息影舊都，將屆十載，自分衰朽，壯志消磨，空懷報國之心，無復禦武之力，謬承獎飾，慚愧彌深，近來敵偽雖不時糾纏，白以 不勝繁冗，故相謝絕矣，白國家觀念仍不減當年，刻居都尚覺安適，祈釋謹念，時當溽暑，賢勞極系，遙冀珍重柱石之身，以肩艱巨之任，蜀天在望，翹企良殷，謹佈區區，統希亮察，弟鄭白叩¹⁰⁵。

吳佩孚這封信寫得比以前客氣，並向蔣說明已謝絕日汪之要求，重點是此信並未有其他要求，也希望蔣珍重其柱石之身，重慶接到這封回信之後，再接到汪精衛連與吳佩孚會面都被拒絕之消息後，相信重慶應該是很滿意的。這第二回合

¹⁰² 馬振犢，〈吳佩孚蓋棺不能論定〉，《國史館館刊》，復刊第 22 期，頁 126~127。轉引自丁小強、吳根樑譯〈吳佩孚工作檔案資料〉，《中華民國史資料叢稿》專題，（北京：中華書局，1987 年 7 月），頁 8~11。

¹⁰³ 〈吳世仁天津電朱家驊—民國 28 年 6 月 28 日發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朱家驊檔案》，第八十函：滬市制裁（制裁漢奸）。

¹⁰⁴ 〈白崇熹以汪由日赴華北拉攏王克敏吳佩孚呈蔣委員長之齊電—民國 28 年 7 月 6 日〉（錄自總統府機要檔案）收在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編印，《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 第六編 傀儡組織（三）》（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民國 70 年），頁 153。

¹⁰⁵ 國史館檔案，頁 44。

汪吳會面及後續，重慶於險中再次取得勝利。

汪日對吳之勸進完全失敗，汪竟連吳一面亦不得見，汪精衛乃於六月二十八日由天津回到上海¹⁰⁶。然而七月十九日日本陸軍省仍不死心，決定關於「汪吳合作」依照既定方針，由日本方面進行積極的活動，由汪精衛方面繼續與吳佩孚聯絡¹⁰⁷，於是汪精衛雖然離開華北但並未因此而放棄拉攏吳佩孚。此後汪吳之間透過陳中孚為信使魚雁不絕，八月二十八日汪精衛在上海召開中國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九月一日汪精衛曾發表通電致海內外諸同志，勸告國民黨前方將領呼應其和平主張¹⁰⁸。此前汪精衛曾再致書吳佩孚，汪函針對時局稱：「若不亟謀收拾，惟有淪胥以亡」¹⁰⁹，九月三日吳佩孚函覆汪精衛稱：「精衛先生執事：自公振迹上海，回翔所喉，屢聆雄談，卷霧籠霄，不徒使人神移意遠，尤幸與鄙見多針芥之合 先生相參，敢謂同道，謀總所宜，特為注念者，即國權如何規復與規復之方式耳。」¹¹⁰，吳佩孚在信中稱他與汪精衛的意見是一樣的，但他在乎的是「國權」要如何恢復？他大概想知道汪精衛新政府的性質。九月五日汪精衛之國民黨中央黨部成立，九月十九日至二十日，汪精衛、王克敏、梁鴻志在南京舉行會談，就召開中央政治會議，成立中央政府問題進行談判¹¹¹。汪精衛與南北兩政府既已達成默契，遂再產生說服吳佩孚之心。

十月二日汪精衛再派陳中孚與吳佩孚會談，陳回到上海後向汪精衛報告，關於新政府名稱汪堅持仍用「國民政府」，但吳不同意，關於定都問題，吳主北京、汪主南京，最後汪答應可以北京為陪都，吳只要加入新政府不必赴南京亦可，但汪要以吳為「軍事長官」，吳卻不以為足，吳要求除掌管軍事外，又欲擔任華北行政，吳要得到中央政府下之政務委員會之類名義，統治華北、四川、湖南、湖北。陳中孚稱吳不承認汪之國民黨「法統」與「黨統」，亦就是吳根本不承認汪之正統性¹¹²。

¹⁰⁶ 蔡德金、李惠賢編，《汪精衛偽國民政府紀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年7月第一版），頁23。

¹⁰⁷ 蔡德金，《汪精衛評傳》，頁367。轉引自日本原駐中國大使館檔案。

¹⁰⁸ 蔡德金、李惠賢編，《汪精衛偽國民政府紀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年7月第一版），頁27。

¹⁰⁹ 蔡德金，《汪精衛評傳》，頁367。轉引自日本原駐中國大使館檔案。

¹¹⁰ 馬振犢，〈吳佩孚蓋棺不能論定〉，《國史館館刊》，復刊第22期，頁127。轉引自丁小強、吳根樑譯〈吳佩孚工作檔案資料—吳佩孚致汪精衛函（民國二十八年九月三日）〉，《中華民國史資料叢稿》專題，（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7月），頁31。

¹¹¹ 蔡德金、李惠賢編，《汪精衛偽國民政府紀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年7月第一版），頁28。

¹¹² 馬振犢，〈吳佩孚蓋棺不能論定〉，《國史館館刊》，復刊第22期，頁128。轉引自丁小強、吳根樑譯〈吳佩孚工作檔案資料—陳中孚汪精衛會談記要（民國二十八年十月二日）〉，《中華

然而其實陳中孚帶回來的吳佩孚意見不見得全部是吳之真意，因為九月下旬「中統」已成功說服陳中孚與另一國民黨要人何世楨，陳中孚與何世楨於國府由南京撤退時，曾奉孔祥熙、居正、于右任三院長指示留在敵後與敵人周旋，二人且負有與日方聯絡和談之任務¹¹³，但是國府撤退以後二人態度不明，依前文所述陳中孚且多次代表日方催促吳佩孚出山，但是九月以後由於「中統」之策反，二人立場已有動搖，「中統」人員催浩上海十月六日電：「陳中孚於九月二十六日由平抵滬，與何世楨晤談，決定對汪逆不合作，日內即將發表談話，並稱吳對汪之合作條件有三：(一)新政府不得受敵人干涉，並應保持完整之主權(二)新政府應設在北平。汪對以上兩點均做不到，故汪吳不能合作。」¹¹⁴，由這封電報看出陳中孚已於九月二十六日被策反成功，其於十月二日竟又奉汪之命與吳佩孚晤談，吳身旁又圍繞著「中統」人員，故陳所攜回吳佩孚開出之條件極可能非吳真意，而可能還是吳與中統人員商討後的敷衍應付之說詞。

回到前文陳中孚向汪轉述之吳所開條件，在這些條件中還是可看到吳的一貫立場，吳佩孚還是要求要有自己的勢力範圍，這與先前他對蔣中正的覆電及對日方的答覆具一致性，都不希望受任何人宰制，能有自己的軍隊。另外吳不承認汪精衛之正統性，這可能是他不甘屈居汪之下，或不認同汪之行爲，但亦有可能他是在暗示汪，重慶國民政府才是正統，理由是前文所提重慶已經說服陳中孚了¹¹⁵，極可能是重慶的影響結果。所以若據吳所開之條件證明其想當漢奸，似乎有進一步商榷餘地¹¹⁶。接吳函後，十月九日汪精衛再致吳一書，汪函略稱：

子玉先生勳鑒：中孚兄來，獲誦九月二日大教 十五六年間，公嘗與國民革命軍為旗鼓之周旋，勝負兵家之常，而公對國民政府始終抗節，天下共見 國民政府急須恢復，以當收拾時局之大任，林主席地位，在法律上明文規定「不負實際政治責任」，故軍事當局宜引咎辭職，行政機關宜改組，

民國史資料叢稿》專題，(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7月)，頁25

¹¹³ 葛覃 吳任滄 滕珂致朱家驊葉楚傖：「查陳中孚何世楨前年秋奉孔子居三院長囑探討中日和平途徑，所有交涉經過均經陳何電呈中央」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朱家驊檔案》，第六十一函：策動反汪。

¹¹⁴ 〈催浩上海電(民國28年10月6日電)〉國史館檔案 抗戰史料 檔號 0160.52 3124.02 微卷號 406 頁 1969。

¹¹⁵ 有關陳何二人被策反之經過，可參考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朱家驊檔案》，第六十一函：策動反汪。或五十五函：陳中孚何世楨。大陸學者楊天石曾據該檔著有〈打入日偽內部的國民黨地下工作者—略談何世楨、陳中孚與陸玄南〉，《抗日戰爭研究》，1991年，第1期，頁45~50。

¹¹⁶ 馬振犢，〈吳佩孚蓋棺不能論定〉，《國史館館刊》，復刊第22期，頁128。作者於舉出吳佩孚所開出之條件後提到：「說穿了，吳不承認『法統』、『黨統』，其現實意義就是不承認汪的『正統性』，目的還是要在日本人面前爭一個『漢奸』老大。」

而主席地位不宜更易，以省糾紛而利進行，至於國民政府之職權及名稱，以暨種種制度，如有更改之必要，於國民大會中議定之。今日國民黨人主張恢復國民政府，其為國民政府謀，忠也，非國民黨人亦主張恢復國民政府，其為國民政府謀，俠也。銘竊願公以一忠字對民國，以一俠字對國民政府。汪兆銘謹啟 十月九日¹¹⁷。

由於陳中孚轉述吳並不同意汪新政府之「黨統」及「法統」，亦即吳不同意以國民政府為名，所以此函汪希望吳佩孚能以「俠」字對待國民政府，同意新政府仍以國民政府為名，再者汪以為抗戰軍事挫敗責任僅在軍事當局，但此點吳並不贊同。

十一月四日吳佩孚回覆汪函，該函不再像以往之客氣模糊，將自己之立場表達頗為清楚，並對汪有諸多質疑，對於支持國民政府「法統」及國民黨「黨統」問題，吳認為「頗謂黨治非急，人治宜先，假令全國人才，能集中於統治大權之下，不任分野，盡天下才，為天下用，鼎盛之局，庶幾旦暮遇之。」也就是吳認為不應行國民黨一黨專政，應廣吸人才。對於抗戰責任問題則提出：「抗戰基於政府之政策，且國以黨治為幟，今因軍事之挫敗，惟軍事當局是問，似不免稍失其平。」吳可不認同責任僅在軍事當局的說法，換句話說吳認為身為國民黨副總裁及抗戰期間最高民意機關參政會議長的汪精衛也難辭其咎。吳越說越無忌諱，對於汪之離開抗戰陣營與敵和談，吳終於提出看法：「公發自重慶之日，關於和平論列，已得政府多數之贊同，近於南中與友邦研討意見，更日趨於接近，宜趁此時機，委屈求全，與重慶為全面之商洽，用使內外交融，悉歸一致，若能駕返西蜀，與友邦(指日本)開談判尤妥」。

吳認為汪既稱重慶也有多人主張和談，那汪應該就其與日本已商得之結果至四川與重慶商洽日方之條件，如果自己組織政府反而難以達到和平，於是他譴責汪之開府將造成禍害稱：

公以國民政府當收拾時局之大任，則於法律方面，即不能同時有兩政府之存在，萬一外內未經協調，和議已臻成熟，一方即組織政府，而重慶之政府依然健在，聽之則屬非法，或致有礙和約之履行，反之則西班牙殷鑒不遠，而人民益將不堪其命。深恐遂如所料，誠國家不幸中之尤不幸矣，弟與公曾為同心斷金之約，公誠於主權領土之保全，悉得其把握，於弟所總總過慮。此節態度義正詞嚴，立場鮮明，完全不同於吳以往之應酬或敷衍，信中也見

¹¹⁷ 《吳佩孚先生集》，頁 443。此信汪稱九月二日獲吳函，與前文檔案中所述九月三日有出入。

不到吳爲自己打算之私心，該信直指汪之和談將造成兩個政府，使民不堪命，若不去推究吳之動機，則該函點出汪的做法完全達不到預期目的。最後對於所謂「汪吳合作」，吳提出：「公誠於主權領土之保全，悉得其把握，於弟所總總過慮者，並得確實解決之法，不致重生枝節，則其餘悉可迎刃而解，不煩計矣。」這話點出了吳某人贊成和談，但須有主權有尊嚴，言下之意他不信任汪式和談，更不可能加入汪精衛式的和平運動的！¹¹⁸吳還在致汪函封面題上：「復公離重慶，失所憑依，如虎出山入匣，無謀和之價值！果能再回重慶，通電往來可也」¹¹⁹吳竟稱汪離重慶已無謀和之價值！這樣的話非常輕蔑，是徹底瞧不起汪精衛的行徑，吳至此可以說公開與汪精衛撕破臉了。相信任何人看完這樣的信應該都不會再自取其辱了！

對於吳佩孚與汪日的交手經過，重慶「中統」仍密切注意著，八月中統天津站曾回報大迫通貞調任「滿洲國」，再度擔任土肥原部屬之旅團長，大迫之職務交由「華北方面軍」杉山軍部負責，杉山及王克敏認爲吳佩孚倔強不近人情，如使其獲得一部份勢力，恐影響彼等之利益故對吳不支援，對吳之一切活動乃告停頓。中統天津站的報告稱雖然如此，但陸相坂垣對吳仍圖利用，坂垣不擬讓吳任軍事而將使其從事政治工作¹²⁰。九月下旬重慶成功策反汪吳信使陳中孚，十月坂垣到北平會晤吳佩孚，並賄賂陳中孚、符定一、張燕卿等竭力包圍吳佩孚，以期動搖其意志，惟吳在重慶影響下則堅守立場，不爲所動¹²¹。十月及十一月汪吳往來函件都由「中統」上海站轉報給重慶，渝方掌握著汪吳聯繫的動向。到了十二月四日傳來了吳佩孚因爲牙痛醫治不良而去世的消息，雙方競逐吳佩孚的工作因吳之暴斃而宣告結束，吳佩孚雖然在這個過程中態度一直頗爲模糊，就重慶方面而言既不答應轉赴重慶，也不答應閉門謝客，但對日本方面吳也未屈服，吳佩孚先是拒絕了土肥原記者會上的要求，即未至開封任「綏靖委員會」委員長，使土肥原因而灰心去職，最重要的是他拒絕了與汪精衛的合作，汪精衛竟然連吳佩孚的面都見不著，所受到的打擊不可謂不大。

四、保留晚節、吳氏暴卒

重慶在這場「吳佩孚工作」的角力戰中算是獲得了最後的勝利，重慶雖然沒

¹¹⁸ 吳之覆函見《吳佩孚先生集》，頁 444。該函亦可見蔡德金，《汪精衛評傳》，頁 369。轉引自日本原駐中國大使館檔案。

¹¹⁹ 蔡德金，《汪精衛評傳》，頁 369。轉引自日本原駐中國大使館檔案。

¹²⁰ 〈端木納天津電—民國 28 年 8 月 17 日電〉國史館檔案 抗戰史料 檔號 0160.52 3124.02 微卷號 406 頁 1966。

¹²¹ 國史館檔案，頁 15。

有得到面子(吳不赴重慶)卻得到裡子(汪吳合作破局)，尤其成功阻止「汪、吳合作」，讓汪精衛的和平運動唱獨腳戲，這有等於向外宣告了汪精衛的所謂漢奸行徑，連與國民黨有隙的舊軍閥們都不一定支持，一定程度上孤立了汪精衛，干擾汪精衛的組織政府工作。重慶對於汪精衛一夥人的地下鬥爭又爭取到一回合的勝利。就吳佩孚本身而言，吳死後受到國民政府孔祥熙、王寵惠及蔣中正等人的褒揚，國民政府更追贈其為陸軍一級上將¹²²，各界的讚揚與弔唁文章紛紛發表，上海市各界甚至紛紛發起捐款建造吳佩孚銅像¹²³。吳死於十二月四日，十二月六日其殯儀在北平舉行，據說儀仗之勝，延續約三里餘，轟動北平全市，民眾夾道相送，途為之塞¹²⁴。吳死後的隔年即民國二十九年一月二十五日，吳佩孚出殯，參加者數萬人，重慶方面同時召開公祭大會。蔣委員長親蒞主祭，祭文中有「薑桂之性，老而彌篤，身處危境，心繫中央」等語¹²⁵，抗戰勝利後，民國三十五年二月，國民政府再於北平為吳佩孚舉行國葬，蔣中正委派北平行營主任李宗仁代表他主祭，參加出殯者幾千人，吳被安葬在北京玉泉山腳下半扇門村村南，由其手下一個師長解甲為之看守墓園¹²⁶。所以當時舉國大多認為吳佩孚是一個愛國者，吳以一個軍閥之身份最後竟能保持晚節，留下美名。就全國而言，吳之事蹟多少應該也激勵了全國抗日的民心，堅定了抗戰意志，並且與汪精衛的行徑造成強烈對比。

吳佩孚最終未與汪日合流，重慶暗地裡透過「中統」天津站及北平站下了不少功夫，更花費了不少錢，「中統」在民國二十八年九月二十六日曾製表上報重慶中央，其自從民國二十八年五月開始即曾送給吳佩孚身邊的人工作費，總計由五月至九月重慶發給他們一萬一千九百五十元整，而十、十一、十二月份擬繼續發給一萬零五百五十元整。至於吳佩孚本人，民國二十七年十一月重慶就曾贈給吳夫人特別費一萬元，二十七年底，蔣中正及孔祥熙曾再分贈四萬元及三萬元以為元旦賀禮，當時吳因日方監視甚嚴，未敢接受¹²⁷。

吳佩孚雖然未附和汪日，但最後仍離奇死亡不得善終，吳佩孚死於牙痛是例來一致的說法，但是其死因咸認並不單純，有趣的是日本人認為他因為頻頻與日

¹²² 謝齊家，〈吳佩孚傳〉，《國史館館刊》，復刊第 10 期，頁 300。

¹²³ 拓荒，《吳佩孚將軍》，(上海:明社，民國 29 年 3 月初版)，頁 77。

¹²⁴ 良友畫報曾刊載：「孚威上將軍吳佩孚將軍之喪，舉國同哀，其殯葬於去年十二月六日在北平舉行，將軍雖死，然其貞節之氣，固千百世而不滅。」《良友畫報—吳將軍之喪》，第 152 期，民國 29 年 3 月號，頁 30-31。

¹²⁵ 《良友畫報—吳將軍之喪》，第 152 期，民國 29 年 3 月號，頁 31。

¹²⁶ 閻鳴，〈晚年的吳佩孚〉，《湖北檔案》，2001 年，1~2 期，頁 100。

¹²⁷ 國史館檔案，頁 45~46。

汪接觸所以被重慶派人害死，曾經爲了調解土肥原與「華北方面軍」關於吳佩孚工作之分歧的今井武夫提到：「吳因治療牙病時并發了敗血症，突然死亡 在中國人當中流傳著吳佩孚的突然死亡，是被重慶政府收買了住在天津的一個某要人，由他指使毒害的」¹²⁸。但中國方面的說法則都直指日人因要求其出山不成最後將之害死。吳死於十二月四日，十二月六日重慶「中央日報」發自香港的電訊標題「吳佩孚死於敵僞之手」，內容稱：

天津外訊，敵因汪逆精衛之偽中央政權不為各方面所同意，乃急圖強迫吳佩孚出任某重要軍職，加強傀儡組織之聲譽。自上月二十五日起，敵即派大批特務人員包圍吳氏住宅，敵酋坂西並親晤吳氏，迫其與汪逆合作，雖為吳所拒絕，而敵酋仍日往逼迫。二十九日起吳氏忽患牙痛，敵囑日醫為之診治，同時吳宅即為憲兵所監視，進出均受檢查，本月三日，吳氏牙痛更劇，日醫商得坂西同意後，施行拔牙手術，此後吳即轉入昏迷狀態，四日午後稍醒，日醫復為之注射，吳氏即復入睡眠狀態，延至下午六時五十分乃與世常辭¹²⁹。

重慶「中統局」關於吳佩孚之死也曾有報告，該報告稱二十八年十一月下旬，吳患輕微之牙痛，吳夫人先請吳家平日深信之天津國醫郭梅臣診治，吳佩孚初服郭之藥方臉腫脹、全身發熱。於是改由齊燮元延請德國醫生診治，德醫要吳赴租界醫院，吳因此舉將違背其「三不」竟不答應，遂改請日醫東一至吳寓割治，日醫手術不佳，血流不止，遂於十二月四日遽然溘逝¹³⁰。「軍統」派在周佛海身邊臥底的「京滬區長」程克祥稱二十八年十二月四日下午三時許齊燮元、符定一及日人川本帶著軍醫處長石田，藉口為吳氏療疾，在吳家強動手術，銳刀刺及喉管，吳遂為日人所害¹³¹。大陸有一種說法甚至稱川本帶著日本醫生為吳診治，該醫稱須開刀但開刀有危險日醫拒不動手，川本堅欲該日醫開刀，不料剛一開刀，吳就啊了一聲死去¹³²。

有關於吳佩孚之死眾說紛云，按照以上說法則吳佩孚之死應屬日人嫌疑較大，然而「傳記文學」曾轉載一篇署名李直峰之文章，該文原發表於大陸，一發

¹²⁸ 今井武夫著，天津市政協編譯委員會譯，《今井武夫回憶錄》，（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7年8月第一版），頁108。

¹²⁹ 重慶中央日報，民國28年12月6日。見《吳佩孚先生集》，頁454。

¹³⁰ 國史館檔案，頁47。

¹³¹ 程克祥口述，黃曜隆編著，《京滬區長》，（中壢：慈恩書局，民國71年6月初版），頁21。

¹³² 陶龔，〈吳佩孚與日僞的勾結〉，《文史資料選輯》，（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6年），總第35輯，頁224。

表即造成轟動，李稱其民國二十八年擔任國府「軍委會」技術研究室人員，專門偵譯日本陸軍無線日文密碼電報，作者稱多次偵譯到重慶「中統局」給北平站站長后大椿關於「吳佩孚工作」的電報，作者稱曾偵譯到重慶「中統局」電北平站要吳佩孚保持晚節，如吳真要就任「華中偽綏靖委員長」職時，就秘密處死他。作者還提到北平站曾回電稱：「吳已發出和平救國通電，並就任了華中偽綏靖委員長職。當即遵命使其隨從副官趁吳牙病已毒死。」¹³³，這位大陸作者李直峰因此斷定吳佩孚是被重慶命令「中統」北平站毒死的。但這樣的說法卻有極大問題，首先按照前文所引國史館檔案資料，「中統局」局長朱家驊確曾發出制裁吳佩孚之命令，發電時間在土肥原逼迫吳佩孚開記者會(一月三十一日)之前兩日的一月二十九日，起先朱家驊的確是因為收到天津站吳世仁之電稱吳佩孚已發電響應就職「綏靖委員長」¹³⁴，在接到吳電後又加以吳佩孚請劉泗英攜回之覆孔祥熙之函又說要剛柔相濟，似乎吳並不排斥與日和談，於是朱家驊於一月二十九日回電天津吳世仁：「如鄭白(吳佩孚)無可挽回，希即予嚴厲制裁」¹³⁵。

然而朱電發出後，在吳佩孚身邊的中統運用人員蔣雁行也在同一天電朱家驊稱吳佩孚之響應日人通電是吳身邊其他人所發，並非吳本意。所以重慶是完全知道吳之響應通電為假，重慶「中央日報」曾在朱下制裁令的當天報導吳之通電係偽造¹³⁶，所以極可能吳世仁之電迫使朱家驊下了制裁令，但蔣雁行之回電又令重慶明瞭事實，況且朱家驊的制裁令也是要到「無可挽回」的時候，並非要立即執行，再者，一月三十一日的記者會後吳佩孚並未就任「綏靖委員長」，這點還引發日方內部鬥爭，迫使土肥原調職，吳還曾因而向英美領事館解釋其不就任立場，重慶當然都知道情況，「中央日報」同樣又在二月二日刊出日方扣發吳當天談話並由日本「同盟社」發假消息的報導¹³⁷。所以李直峰之文提到中統北平站因吳佩孚出任「綏靖委員長」一職而將之殺害是不大可能的，甚至重慶「中央日報」關於吳佩孚之正面消息極可能都是來自中統北平站及天津站。

更何況日方假造吳發通電響應擔任「綏靖委員長」是在一月底，而吳佩孚是死於十二月初，有可能拖了十一個月才執行制裁嗎？以中統收買了吳佩孚身邊那

¹³³ 馬芳踪，〈吳佩孚死因又一說〉，《傳記文學》，第 67 卷第 5 期，民國 84 年 12 月號，頁 24。

¹³⁴ 〈吳牛天津電朱家驊—民國 28 年 1 月 28 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朱家驊檔案》，第八十函：北方制裁(制裁漢奸)。吳牛即吳世仁。

¹³⁵ 〈朱家驊電天津吳世仁—民國 28 年 1 月 29 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朱家驊檔案》，第八十函：北方制裁(制裁漢奸)。

¹³⁶ 重慶中央日報，民國 28 年 1 月 29 日，《吳佩孚先生集》，頁 451。

¹³⁷ 重慶中央日報，民國 28 年 2 月 2 日，《吳佩孚先生集》，頁 453。

麼多人的情況下，是很容易隨時執行制裁的¹³⁸。況且按前文所述六月中朱家驊曾電吳佩孚勸勉，其中有要其不要與汪精衛合作之意，果然六月下旬吳佩孚拒絕見汪精衛，七月白崇禧再把吳佩孚拒見汪精衛之消息報告蔣中正，於是蔣中正再發電吳佩孚，蔣之電讚美吳能不隨汪精衛起舞¹³⁹，而吳之回電也比之前客氣甚多，要蔣珍重其柱石之身，依前文所述其實吳佩孚與重慶的互動是越來越好，之後吳佩孚與汪精衛往來函件重慶透過中統都是知道的，吳佩孚十一月四日回覆汪精衛之函中有要汪回重慶否則無謀和之價值的話，吳這樣的態度重慶應該很安慰，不大可能動殺機的¹⁴⁰。

在國史館檔案資料，中統所呈報之「吳佩孚工作」只提到吳因牙疾而死，並未提到吳被中統人員制裁而死，按理「中統」及「軍統」人員當完成一件制裁案都會把事實向上級報告，替行動人員要求撥發獎金，而中統該報告是呈給侍從室的，即是給蔣中正看的，故不大可能殺了吳佩孚卻隱而不報，再者該報告有一段稱：「吳臨危時，曾囑蔣雁行向中央轉達其至死不為敵用之決心。」¹⁴¹除非「中統」之報告連國家領導人都要隱瞞否則吳佩孚不太可能是死於「中統」之手。那會不會是死於「軍統」人員之手呢？若真如此「中統」那樣多內線會不知道？此外吳佩孚死後蔣中正及行政院長孔祥熙都曾致電吳家屬慰問¹⁴²。如果吳為重慶所殺，蔣及孔能矯情到如此地步嗎？吳夫人張佩蘭能接受這樣的唁電嗎？

中央研究院《朱家驊檔案》中有一份資料提到，吳死後隔年民國二十九年十月吳佩孚之夫人張佩蘭曾透過蔣宋美齡向國府教育部請求，准許其兩位大學尚未畢業之寄女(義女)出國留學，巧的是當時的教育部長為朱家驊，即朱已由「中央執行委員會祕書長」及「中統局局長」調任「教育部長」¹⁴³。如果吳佩孚是被中統所殺，張佩蘭還會向朱家驊做這種要求嗎？這是間接透露了吳佩孚雖死但吳家和國府關係良好，故吳佩孚不大可能是國府所殺。那麼吳佩孚是否被日人殺死？吳佩孚因為一顆牙齒而死實在太過離奇，而日人從二十七年十月開始不斷鼓動吳

¹³⁸ 按吳佩孚身邊曾接受「中統」津貼者除蔣雁行外尚有以下人員：金權(叢大經)、吳道時、張才宥、趙子賓、張瑞峰、蔣毓榮、陳開策、胡觀生、郝扶唐、洪晉澎、宮鼎臣、趙得欽、鄧如琢、洪大慶等人。見國史館檔案，頁 46。

¹³⁹ 按國史館檔案資料中並未附七月的蔣致吳電，僅有吳之覆電，但由吳之覆電內容可推測蔣是讚美其拒見汪精衛。

¹⁴⁰ 「中統」上海人員湯棟曾在 10 月 17 日及 11 月 11 日將汪吳函件內容電報重慶。國史館檔案 抗戰史料 檔號 0160.52 3124.02 微卷號 406 頁 1970~1971，1989。

¹⁴¹ 國史館檔案，頁 47。

¹⁴² 相關唁電參見《吳佩孚先生集》，頁 469。

¹⁴³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朱家驊檔案》，第四八二函：蔣中正、蔣宋美齡、蔣經國、蔣緯國。

佩孚出山，然而吳不但氣走土肥原，還拒絕「汪吳合作」，最後吳竟在日人面前褒蔣貶汪，日人對吳佩孚的工作最後是徹底失敗，按常理判斷日方及重慶那一方比較有理由殺掉吳佩孚就很明顯了，況且各種資料都顯示吳最後是被日醫給醫死，所以即使吳不是被日方暗害而死，日方也要為其醫術太差而負責。

此外吳佩孚到底是愛國者還是漢奸？筆者認為吳佩孚也許不能算是個愛國者，但若稱其為漢奸似乎亦太過沉重，在亂世中每個人最先一定是考慮自己，尤其民國二十七、八年間國府抗戰形勢之惡劣，日軍攻城略地，進展神速，任何人都要懷疑國府是否還撐得下去，如果吳不看好國府擔心國府垮台，那麼先向國府要求一支軍隊及自主之地盤，以備國府被日軍擊滅後能擁有一席之地。這是為自己後路作打算，吳這個想法頗為自私，但抗戰期間擁有地方武力不服從重慶的尚有中共，若吳這個想法須譴責的話那中共也是搞割據，同樣是培植一黨勢力，只是野心大小不同而已，其目的和吳佩孚並無兩樣。

再者吳佩孚為何不赴重慶？試想當年吳是被蔣中正的國民革命軍搞垮的，吳曾被逼得走投無路遠赴四川，甚至還曾遭到國民政府之通緝¹⁴⁴。故要求其赴重慶是否太過不顧人情？雖然國家民族災難恆互於前，但吳不是聖人仍無法屏棄其個人恩怨。所以吳佩孚與重慶的互動不足以檢驗其愛不愛國，主要還是要從吳佩孚與日方的接觸觀察，但是由吳與日方的談判內容來推測吳是漢奸似乎也不大公平，因為吳處在日軍鐵蹄之下的北平，即使其不想答應出山，也要在談判之用語及措詞避免激怒日方，除非吳準備殉國，但是像文天祥這種人應該是鳳毛麟角，更多的是識時務的人，吳應該這兩種人都不是，他不想屈服於重慶但也忌憚漢奸之名。

判斷一個人若由其行為出發或許會較持平，吳佩孚在一月底的記者會不按日方談話稿發表談話，最後迫使土肥原工作面臨失敗，一直拖到六月日方都無進展，而六月底吳再拒絕會見汪精衛，這件事的影響應該很大，因為讓「汪吳合作」破局，不管吳拒見汪精衛動機何在，吳這個作為應該很接近愛國的標準。此後吳不僅在行動上一直未答應汪精衛之要求，甚至開始在言語上批汪，尤其十一月四日覆汪之函，寫得大義凜然，吳佩孚於一個月後莫名其妙死去也許跟其下半年的態度越來越強硬有關，反而可以說吳佩孚是因拒當漢奸而死。然而話雖如此，吳卻有另外一個選擇那即是離開北平，這也是重慶的建議，吳不必答應一定赴重慶

¹⁴⁴ 許念暉，〈土肥原策動北洋派大同盟的內幕〉，《文史資料選輯》，（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6年），總第29輯，頁149。

但他是可以離開北平的，吳不作這樣打算卻還要與日汪糾纏不清，他的死用「玩火自焚」的字眼也許太過嚴重，但其實他自己要負最大的責任。

汪精衛聯絡吳佩孚的工作雖然在十二月初因吳之死而告結束，但汪並未因此而停止其所謂和平運動，尤其當時汪精衛正緊鑼密鼓進行其國民政府還都之工作，對於汪精衛組織政府的行徑，重慶非常擔心並由其南京與上海地下工作人員繼續進行破壞活動，重慶靠著「中統」所收買的吳佩孚之參謀長蔣雁行等人，才得以截住吳佩孚，讓吳不要響應汪精衛。但是中統雖對吳佩孚勸阻成功，然而勸阻工作最大的兩個功臣吳之親信蔣雁行與中統人員后大椿竟然雙雙轉投汪精衛，民國二十九年十月蔣雁行被「中統」發現與汪精衛接觸，重慶隨即解除其「軍委會」職務¹⁴⁵，而擔任中統北平站負責聯繫蔣雁行的后大椿竟亦於三十年一月底赴上海後行蹤不明¹⁴⁶，不久后大椿投入汪精衛政府，擔任李士群之江蘇省政府的糧食局長¹⁴⁷。這些都是重慶始料未及的，也令重慶瞭解到汪精衛組織政府將造成不小的負面影響，於是因應「新政府」的成立，雙方再展開另一回合激烈的鬥爭。

¹⁴⁵ 「查北平蔣雁行前因派其對吳子玉工作關係，曾呈准由軍委會給予名義，並月致薪奉五百元，現據北平工作同志報稱，該員現亟謀與汪逆接近，似應撤銷名義及停發薪給。」〈朱家驊致軍事委員會—民國 29 年 10 月 31 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朱家驊檔案》，第八十函：北方附逆。

¹⁴⁶ 「后大椿赴滬一去不返，似無再予以名義之必要」〈朱家驊函徐恩曾—民國 30 年 1 月 28 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朱家驊檔案》，第六十一函：京滬附逆。

¹⁴⁷ 后大椿最後因米糧貪污案被日方槍決。見袁愈佳，〈日汪勾結掠奪中國資源概述〉收在黃美真編，《偽廷幽影錄—對汪偽政權的回憶紀實》，頁 178。